

魏源年譜

黃麗鏞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021 0793 2

魏源年譜

黃麗鏞

魏源年谱

黄丽镛

责任编辑：徐日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3,000 印张：10 印数：1——2,250

统一书号：11109·247 定价：2.15 元



魏源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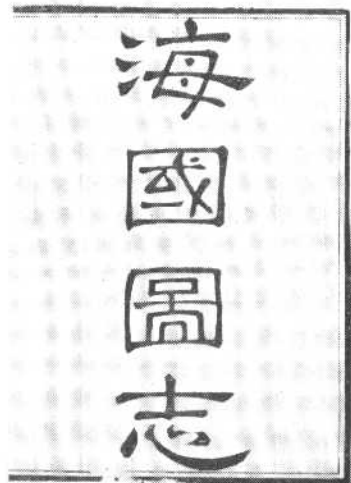
道光甲辰年鐫

聖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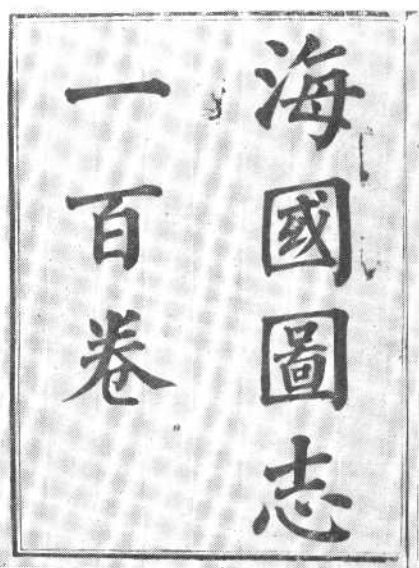
京都琉璃廠頤行

聖武記敘

荆楚以南有積威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
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歲捕靖賊之
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徵仕京師京師
肇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
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說
國初數言大事嘉祥乎爾爾旁藩乎胸腹固以劉劉
子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備
江淮海警處急軍調督至俄然屬其中之所積乃垂發
其積成排比無錙兩兩在懷先取其善兵事及所論諸者



《海國圖志》五十卷本、
六十卷本(从左至右)及百
卷本封里



空山無人沉思
獨往木葉盡脫
石氣自青羚羊
挂角無跡可求

余聞秋舫詩此其第四次矣如羊角風轉而
藍上如白雪曲唱而愈為大抵中晚年是
其轉調為子後乃其進境其中甘苦曲
折源一龍志之學問之道無窮而性情
之改有本改而如改過心虛而力勇自
今歟子秋舫益勉之己邦益求魏源校
畢再識

世恩弟周治懷請于靜妙



乎其庶幾乎道光
壬午季春默深氏
書于藤陰書屋

成連東海刺舟
而去漁洋山人
言之而不能為之
也太初其庶幾

魏源第四次和第五次跋陳沆《簡學齋詩稿》

目 录

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代前言）	杨慎之 1
编例	16
魏源年谱	19
魏源著述	
一、魏源著述目录	203
二、魏源已刊著作之版本及各家评述	206
三、有关丛刊、汇编所收魏源诗文目录	271
魏源研究资料	
一、论著索引	287
二、论文索引	292
征引书目	301
后记	311

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

(代前言)

杨慎之

林则徐和魏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头脑比较清醒，他们的思想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前进，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发端启牖的作用。林则徐以虎门烧烟的壮举，和对英国侵略者的坚决抗击，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和英雄本色。魏源以爱国主义思想家的面貌出现，毕生孜孜矻矻，编译撰述，宣传经世致用、变革进化和富国强兵的学说。他的卷帙浩繁的著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影响深远、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

一八四一年六月，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第一线指挥作战的林则徐，被清政府免去了四品卿衔，发配伊犁效力“赎罪”。北上途中，林则徐路过江苏京口，在这里，魏源盛情地接待了他。这是一次壮怀激越的会晤，对此，魏源作了生动的记载：“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鳬”^①。林公撰《海国图志》。① 国势沉沦，外侮日亟，

两位肝胆相照、报国无门的朋友，忧愤在胸，万感交集，见面时倒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两个人终宵对榻，夜雨谈心，最后，林则徐把自己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时组织人们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以及船炮模型图样等资料，统统交给魏源，嘱他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魏源不负友朋同志之托，根据林则徐所提供的资料，“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又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②辛勤编纂，于一八四二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的时候，就将《海国图志》的五十卷本刊刻问世了。^③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标志着魏源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峰。这部囊括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民族、宗教、历法、文物的百科全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于清朝政府昏庸愚昧、投降媚敌的倒行逆施，更是一种有力的鞭挞和冲击。《海国图志》的总序和后序，说明了编纂这部巨著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作为该书第一、二卷的驰名的军事、政治论文——《筹海篇》，全面总结了守、战、款（即外交事务和谈判）的经验教训；此外，在《海国图志》所收集的弘富资料中，魏源钩玄提要，写了许多条精辟的按语。总序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④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魏源和他的挚友林则徐一样，把了解和掌握“夷情”放在首位。魏源说：“悉其情则知其控驭”，^⑤因为，“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⑥“欲悉夷情者，必先立夷馆、翻夷书始”。^⑦这就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一个总出发点。我认为，直到今天，这部书之所以仍然值得历史地给以肯定，就是因为

它开启一代新风，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夺目光辉，它的总出发点是正确的，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一百四十年前作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提出来，确是一种卓绝的见解，非常的高论。这个爱国主义的主张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内容：师，长技，制夷。师，就是学习，仿效，拜老师。落后了，就应该老老实实，放下“天朝帝国”的臭架子，承认自己不行，赶快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长技，按魏源的说法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⑧前两项是物，指的是坚船利炮，后一项是人，指的是有律、有谋、有勇之兵，当然也包括有德、有胆、有识之帅。制夷，就是反对侵略，保卫国家，以自己的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作后盾，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克敌制胜。初时，魏源是主张向外国购买船炮的。他认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⑨“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夷”。^⑩往后，魏源的认识有所深化，思想有了发展，明确主张设厂自造，并且进一步主张国防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魏源指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⑪应该着重指出，魏源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主张的时候，是充满着民族自信心的。他没有被西方侵略者不可一世的凶焰所吓倒，他对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以及由此而在历史上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光荣和骄傲。他满怀民族自豪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指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食，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暑刻，不亚西土；至

罗铍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⑩魏源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先进的，现在落后了，挨打了（怎么落后的？为什么挨打的？这个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原因，魏源终其一生并未找到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毕恭毕敬地向人家学习，学习那些对于自己有利的、有用的东西，“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如果急起直追，那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⑪冥冥上苍并没有赐给西方一个特别圆的月亮。在世界文明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东方的中华民族，只要厉精粹志，奋发图强，就能自立于当代世界之林，赶上并且超过西方。

一百四十年前的魏源，毫不顽固保守，妄自尊大，主张学习和掌握人家的长技；毫不奴颜媚骨，妄自菲薄，认为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一种坚定自若的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思想，这样一种炽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正是我们的族魂所在。距今大约半个世纪，鲁迅写过一篇题为《拿来主义》的杂文，我们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批判了中国一向的“关门主义”和新近的“送去主义”之后，一点也不含糊地主张：“运用头脑，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鲁迅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按此标准衡量，魏源的确不愧为鲁迅所予以肯定的、出现得比较早的、相当高明的“拿来主义”者，的确不愧为一个“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执行“拿来主义”原则的先行者。^⑫

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鸦片战争史——《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正是魏源。在这部两万多言的著作中，魏源以昂扬的爱国主义热情，表扬了林则徐等抵抗派的功绩，赞颂了虎门缴烧

鸦片的大无畏胆略，讴歌了广州三元里人民气壮山河的抗英斗争，表达了“义民可用”的鲜明立场，肯定了抗御强敌、外敌的带有朴素的游击战争色彩的战略战术；对清朝政府的举措失当，丧师辱国，和地方大吏的乖张失度，畏葸无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特别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和《海国图志》一样，阐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张，比较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魏源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从全局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个浪战、浪守、浪款的过程，战，“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款，“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在魏源看来，如果当时能够择地利而守，以守为战，以守为款，就不致于吃败仗，“可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指赔款），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就能“一举”而“富国强兵”。⑤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讲的这些话，应该说是一种公正持平之论。但同是这位学术界巨子梁启超，就在同类著作中，又认为《海国图志》“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在今日诚为刍狗”，“其书至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就有点失诸偏颇了。当然，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海国图志》在科学上的认识价值，

不会是很高的。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很多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不能否认的。自魏源的《海国图志》一百卷版本问世，至梁启超发表这些议论，相隔六、七十年之久，其间，事变迭起，形势发展极其迅速。在此情况下，梁启超的视野展拓，知识益增，他的见解超越前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前进了，时代发展了，情报讯息的交流丰富而且加快了，六、七十年之后的梁启超，和一百四十年之后的我们这些人，重新检阅翻读《海国图志》，当然会觉得魏源爱国之志有余，系统的科学性不足。但是，“筚路蓝缕”，前人创榛辟莽之功，理当受到尊重，如果后人表现出肤浅可笑的优越感，傲视前人，那是毫不足取的。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政治见解和治学观点上，曾经有过分歧，但终其一生，梁并未对康采取贬抑的态度，以讥讪诋诟之词加之。但就是这位康南海先生，据其《自编年谱》所载，二十二岁时“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在《海国图志》和《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所提出来的筹海三策（守、战、款），有些论点确有错误，有些主张不切实际，对此，和魏源同时代的人就曾提出异议，指陈其大醇中之小疵。但是，终魏源之世，清朝政府佶佶偾偾，颞颥敷衍，“海警飘忽，军问沓至”，^⑩外国侵略者穷凶极恶地打上门来。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自当轴秉钧以至封疆大吏，都惶惶然无所措手足，惟独魏源这一批地主阶级的开明改革派，发出了异乎凡响的时代最强音：“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这是极其深刻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当时流行的议论说，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魏源力排众议说，“有用之物，即奇

技而非淫巧”。^⑩当时的人们“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⑪甚至闹出笑话：“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⑫到了鸦片战争已经持续地打了两年之久的一八四二年，那位“受命于天”的道光皇帝旻宁，还在询问英国座落何方，周围几许，属国多少，和俄罗斯是否接界，与新疆回部有无旱路可通，英国女王有无匹配，等语。针对这些荒谬绝伦的现象，魏源坚决主张：“立夷馆，翻夷书”，尽快、尽量掌握夷情，做到“谏以敌形，形同几席；谏以敌情，情同寝馈”。^⑬我认为，先驱的劳绩绝不可没，他们为天下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永远缅怀敬仰，并且加以发扬光大。

《海国图志》的编纂者是魏源，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似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也有人以第一卷署“邵阳魏源撰”、第二卷署“邵阳魏源重辑”为据，并以魏源没有亲身参加广东战事为由，断言《筹海篇》不完全是魏源所作，他的思想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其实，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魏源的确没有参加广东战事，但他为什么不可能从最有发言权的林则徐等人那里得到第二手资料呢？《筹海篇》中涉及浙江战事甚多，其叙述之深刻精当，首尾贯通，不是亲历其境的魏源又怎么写得出来呢？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大变局。一八一六年八月，英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来华，谋改进中英贸易关系，嘉庆皇帝因为这位外国使者不肯磕头，把他撵回去了。事隔二十四年，人家打上门来了。这回不是你勒令人家磕头了，而是人家逼你跪着投降了。这是一个覆地翻天的变化，它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反映出来。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旻宁、穆彰珂、琦善之流的投降派，就会出现广大人民群众和林

则徐、魏源、关天培、陈玉成这样的抵抗派。投降派大弹唯武器论的烂调，抵抗派揭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这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广东战事，浙江战事，各种各样的观点，形形色色的议论，都在林则徐、魏源这些人的头脑中引起激荡，使他们认识到，要战胜侵略者，就要有先进的武器，要有出色的指挥员，更要有勇敢的战斗员（不但“义民可用”，甚至“莠民”也可用）。《筹海篇》代表了这种时代思潮，是当时千百万爱国者的共同心声，它通过有概括能力的、爱国的思想家魏源系统地反映出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是在鸦片战争败北、民族危机深重条件下的一种突发性的产物。它是渊源有自的，是和他毕生奉行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躬亲履践的变革主张，选贤任能的人才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正是由于魏源一贯强调经世致用、勇于变革、爱才惜才，才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紧迫关头发展到了高峰。在这里，客观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是起了触媒剂的作用而已。

作为地主阶级的开明改革派，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淑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近人齐思和指出：“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①台湾学人王家俭也指出，综观魏源之一生，“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图边防，策海防以言战守”。^②这都是深中肯綮的评价。什么是经世致用呢？蒋方震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作序时谈到：“致